

严文明著

史前考古论集

科学出版社

史記

史記
前漢書
古文書
論衡
集解

卷之三

史前考古论集

严文明著

科学出版社

1998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主要论文计 40 篇,发表的时间从 1958 至 1990 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综合性研究(10 篇),前 5 篇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第 6 篇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后 4 篇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历史。第二部分为地区性研究(21 篇),分别就长城以北、黄河中上游、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年代分期、发展阶段和相互关系等广泛的课题进行了讨论。第三部分为专门性研究(9 篇),对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及有关东夷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书可供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者及相关专业学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前考古论集 / 严文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1
ISBN 7-03-006157-8

I. 史… II. 严… III. 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集 IV. K871.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4497 号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8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6 1/2 插页: 2

印数: 1—1 800 字数: 530 000

写在前面

本书收集了作者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主要论文计 40 篇，发表的时间从 1958 年到 1990 年。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其它文章，凡已收入《仰韶文化研究》（1989 年）的以及关于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的均不收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曾正式发表过，只有少数几篇注明采自《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是我分别于 1964 年（红皮铅印本）和 1972 年（蓝皮铅印本）所写讲义的有关章节。这两本讲义在国内早已广泛流传，实际上也是发表了的。这次编排成书，除个别词句作了修改外，一仍其旧。因而大体上能够反映我研究中国史前考古，主要是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艰难历程和基本内容。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综合性研究，有 10 篇文章，前 5 篇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第 6 篇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后 4 篇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历史。比较前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1972 年与 1986 年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差距。1972 年首次提出了老官台文化的命名，并把它看成是仰韶文化的先行文化，同时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分了早晚，又以此为基础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理出了一个粗线条的谱系关系，这在当时还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我自己并不满足。我从 1958 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时，就想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关系理出个头绪。除了地区性差别外，还想从整体上进行分期，以便把它放在发展的基础上来观察、分析和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商周考古可分早商、晚商、西周、春秋，新石器时代考古怎么就不可以分个早晚呢？话是这么说，但由于当时田野考古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存在的缺环还比较多，这一想法虽然合理，实际上却无法做到，最多只能在局部范围做点文化分期的研究。1976 年，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都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我随即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磁山文化的命名，并把它同老官台文化一起列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本书第 15 篇）。在这前后，一些过去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陆续发现小件铜器，于是我又提出有必要划分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阶段（本书第 5 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在 1986 年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谱系的全面方案，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的主要内容。由于近年来田野考古发展较快，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这个方案自然有必要随时加以充实和修订。例

如原方案中新石器时代只分为早晚两期，1987年即把原早期的较晚阶段独立为中期，从而变成了早中晚三期，各期的绝对年代也有变动（本书第6篇）。不过这篇文章不仅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谱系的方案，还特别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阐释了这个谱系的发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文章着重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基本上形成为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或者简称之为多元一统的格局，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往后历史的发展。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凿通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特点所以产生的原因。比如中国古代文明为什么是独立发展而不是外来的？为什么是唯一保持连续不断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历史上为什么有分有合而统一始终占主导地位？为什么会出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如此重大的问题自然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不过是做了一点试探而已。

关于聚落形态的研究，我是从西安半坡早期遗存的分析开始的，但得不到要领而作罢。后来分析临潼姜寨一期村落遗址时才找到了一套基本可行的方法，从而对仰韶早期的社会有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则第一次从宏观上研究整个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演变的规律，并且尽可能地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类研究现在也正在不断深入，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向是从村落群演变为城乡统一体的过程中，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几篇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不是仅仅叙述历史事实，而是力求从学科发展的历史中认识学科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对后学者来说则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宝贵的启示。

第二部分为地区性研究，有21篇，分别就长城以北、黄河中上游、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年代分期、发展阶段和相互关系等广泛的课题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以下几篇文章：第11篇是最早对长城以北的新石器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文章，因写作年代较早，其中有关内蒙古东南的红山文化部分资料较少，反映很不充分。后来的发现和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第14篇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东山嘴的祭祀遗存进行的讨论。第23篇是我应山东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岛县博物馆之邀，带了几名研究生对长岛县主要海岛的史前遗址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考察的结果，后来导致了对大黑山北庄遗址长达数年的富有成果的发掘。第24篇主要是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同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在胶东进行了多年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对胶东史前文化发展谱系提出的一个初步认识。文中指出胶东新石器文化既是自成一系的，又是整个山东文化区的组成部分。而关于岳石文化等的分析，则是从考古学遗存中对东夷文化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第26篇和第30篇第一次对江浙地区和鄂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提出了明确的分期。尽管现在这两个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那个

分期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的基础。第 28 篇则是企图对花厅墓地表现的文化碰撞现象作些解释，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不要只注意相互影响等比较平和的一面，还应该注意相互碰撞或征服等激烈的一面，而后者在考古学遗迹中是并不罕见的。

第三部分为专门性研究，有 9 篇文章。第 32 篇首先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进行了研究，进而提出他们应是史前东夷祖先的见解。第 33 和第 34 篇则对东夷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东夷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强大的民族，曾经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互争雄长，直到战国以后才完全被华夏族所同化。过去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把东夷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究竟什么是东夷文化，在考古学上是未曾界定的。80 年代初，我们在胶东广泛展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寻找东夷文化的踪迹。在长岛县北长山岛的珍珠门遗址，我们发现一种以手制素面红陶鬲为代表的遗存，前所未见。幸好有少量灰陶绳纹鬲等晚商遗存共出，才可大致断定它的年代。珍珠门一类的遗存同它以前的岳石文化有比较多的联系，而商文化是从中原侵入的。这两类遗存在山东境内的分布和消长过程，与历史上华夏和东夷关系的记载若合符节。因此我们认定珍珠门文化和它的前身岳石文化，以及它的后继者乳山南斜山一类的遗存实为东夷的文化；岳石文化以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则为东夷祖先的史前文化。至此东夷文化的探索才有了一个头绪。

第 35 篇是对河北邯郸涧沟发现的 6 个属于龙山时代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进行研究的一篇短文。该文广泛考察了中外历史上类似风俗流行的情况，认为它是欧亚北方民族发展到原始社会之末、文明社会行将兴起的时期相当广泛地流行的两种风俗，直至商周时期还有它的残余。

第 36 篇专门研究中国史前文化中颇为流行的炊事用具陶支脚。它与陶釜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以及在某些场合的共存现象，说明它们是共同使用的。而这两种器物与后来出现的陶鼎在分布上大面积重合及其使用功能上的继承关系，说明釜与支脚的结合乃是陶鼎产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

最后四篇讨论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特别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是为 1989 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环太平洋史前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文中的主要论点是：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地，一个在华北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后来发展为以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体系；另一个在华中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后来发展为以种稻为主的水田农业体系。它们是孕育中国古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否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如果是，究竟是在华南、云贵高原还是长江流域，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根据河姆渡等地的发现，首先提出长江下

游及其附近应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根据新的资料认为长江中下游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并且力求作出理论性的解释，这就是后来被概括为“边缘起源论”的主要论点。《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则主要是根据湖南澧县彭头山所发现的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的稻谷遗存，重申了前两篇文章的论点。此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又发现了公元前一万年以前的稻谷遗存，稻作农业的长江流域起源说也已经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研究的问题虽然比较广泛，但就整个史前考古或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应研究的问题来说，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研究过的问题也还有不深不透的地方，甚至还有不少错误，恳请读者加以指正。由于各篇文章写作的时间不同，后写的文章往往补充了前文的不足或纠正了前文的错误。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是想真实地反映我对某些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如果还能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我国史前考古成长的情况的话，就更有意义了。

《仰韶文化研究》出版以后，一些年轻朋友建议再出一本范围广泛的史前考古文集，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我的研究成果。我则总想再写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急于结集，所以一直没有动手。这次是在洛阳市文物局郭引强同志的一再提议和大力支持下以及科学出版社的合作才得以实现的。由于原有插图表现方式不尽一致，有的已不甚清晰，有必要全部重新清绘，韩建业同志在学习和工作都很繁忙的情况下欣然承担了这一工作，曹音同志负责英文目录和提要的翻译，杨新改同志则担任了繁重的编辑任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写在前面 (v)

第一部分 综合性研究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1)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统及社会制度的探索	(18)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2)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24)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35)
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48)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简史	(63)
1983 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76)
1984 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86)
尹达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贡献	(96)

第二部分 地区性文化研究

长城以北的新石器文化	(105)
《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读后	(123)
在内蒙古西部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125)
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132)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	(138)
半坡村落及渭河流域的原始部落	(146)
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	(154)
喜读《淅川下王岗》	(161)
马家窑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	(167)

马家窑文化	(172)
略论大汶口文化	(180)
论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	(190)
长岛县史前遗址	(205)
胶东原始文化初论	(227)
山东史前考古的新收获	(248)
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254)
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260)
碰撞与征服	(262)
安徽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的初步观察	(267)
鄂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273)
江陵毛家山发掘记	(281)

第三部分 专门性研究

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	(293)
夏代的东方	(306)
东夷文化的探索	(319)
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	(334)
中国古代的陶支脚	(339)
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351)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362)
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	(385)
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	(400)
Abstract	(407)

Contents

Preface	(v)
---------------	-----

Part I Comprehensive Studies

Unity and Diversity of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s	(1)
Genealogy and the Social System of Chinese Neolithic Cultures	(18)
The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Chines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s	(22)
Longshan Culture and Longshan Age	(24)
On Chalcolithic Age in China	(35)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Chinese Neolithic Period	(48)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Neolithic Archaeology Research	(63)
N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1983	(76)
N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1984	(86)
Yin Da's Contribution to Neolithic Archaeology	(96)

Part I Regional Studies

The Neolithic Cultures North to the Great Wall	(105)
Remarks on "The Sites of the Microlithic Culture Discovered in the Inner Mongolia"	(123)
Speech on "Symposium of Primitive Cultures in Western Inner Mongolia"	(125)
Speech on "Symposium of Archaeology of the Great Wall and the Yan Mountain Region"	(132)
New Discoveries of th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138)
The Banpo Settlement and the Primitive Tribes in Wei River Valley	(146)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Archaeology	(154)
Pleasant Reading of "Xichuan Xiawanggang"	(161)
Majiayao Type is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aodigou Type of Yangshao Culture in Gansu	(167)

On Majiayao Culture	(172)
Briefing on Dawenkou Culture	(18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liangang Culture and Dawenkou Culture	(190)
Prehistoric Sites in Changdao County	(205)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imitive Cultures in Eastern Shandong	(227)
New Achievements on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Shandong	(248)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Lake Tai and Hangzhou Bay	(254)
New Stage of the Research to the Liangzhu Culture	(260)
Colliding and Conquering	(262)
The Genealog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Anhui	(267)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Northwestern Hubei	(273)
Excavations at the Maojiashan, Jiangling County	(281)

Part II Specific Studies

Dawenkou People's Custom of Tooth-Extraction and Their Ethnicity	(293)
The East in the Xia Dynasty	(306)
Exploring the Dongyi Culture	(319)
The Skull Cup of Jiangou and the Custom of Scalping	(334)
The Pottery Stands of Ancient China	(339)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351)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in China	(362)
More on 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in China	(385)
New Discoveries on Prehistoric Rice Agriculture Remains	(400)
Abstract	(407)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历史根基的探索和认识，是近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起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那时有不少外国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分强调了外国史前文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乃至“南来说”、“北来说”等无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错误倾向。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前期，中国史前考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外来说被新发现的许多事实证明不能成立，因而为学术界所抛弃。但那时的田野工作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人们对当地史前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其它地方的史前文化所知甚少。因此在一个时期内，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文化革命”期间更发展成了所谓中原中心论，把其它地区的文化成就都看成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从 7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中原开展田野工作外，对其余广大地区也进行了许多调查发掘工作，有不少新的重要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地估计各地史前文化发展的水平，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特别是从苏秉琦先生提出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研究以来，许多考古学者一方面倾注力量对区域性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又注意从宏观方面考察各地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轨迹，并力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而使我国史前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在我们初步认识到：

1. 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某些边境地区同邻境的史前文化发生过一些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对双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中国史前文化的主体来说，却从来没有影响到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
2. 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这在旧石器时代即可窥其端倪，到新石器时代就显得更加明显。不但如此，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新的分化，从而使文化面貌

* 本文为作者参加 1986 年 6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发表于《文物》1987 年 3 期。

显得十分丰富多采。

3. 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地说，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文化也较为发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但文化发展是能动的，所以这种差别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动的。

4. 由于各史前文化相互邻接，长时期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共同因素，这一情况在中原及其周围文化之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就是说，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这个特点是在中国具体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本文拟先从史前文化地理背景的分析谈起。

一、史前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的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正好位于全国的核心，同邻境文化难得保持经常性的密切联系。加上北部有大片的沙漠、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作为屏障，东北有长白山、乌苏里江和鸭绿江等与今天苏联远东省和朝鲜为界。这些地方对于史前人类来说虽不是不可通过的，但交通毕竟有较大的困难。中国南部有横断山脉地带和十万大山等与东南亚各国为界，交通也十分不便。东部和东南部与日本、菲律宾等隔海相望，在史前时代更不可能有经常的来往。至于同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这样一些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和古代文明中心，不但相距遥远，中间还隔着大片高寒地带、高山和沙漠，无法建立起任何直接的联系。后世虽曾开辟出像丝绸之路那样的通道，但是路途漫长而多艰险，史前人类是难以克服这许多障碍的。

由此可见，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

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同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联系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中国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内部也不是单一的。它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各地水文、土壤和植被等差别极大，按照综合自然区划一般要分为七八个基本的大区，每个大区还可分为若干亚区。各区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产、生活与交通条件大不相同。这种情况对于史前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活动方向和各种文化特征的形成，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不过自然区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基本稳定的，而人类的活动和文化的发展则是能动的。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人们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利用和改造的情况也不相同。人们还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可以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自行调整经济活动的方向，还可以在不同的群体间进行物资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因此，我们要防止把自然区划简单地套用在史前文化分区的研究上，而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无论如何，中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应是造成史前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分为早中晚三期，自始至终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别，首先是华北和华南（均从最广义的意义来说）这两个大区的差别，两区内又还有较小的差别，从而形成互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谱系（表一）。

华北地区（泛指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山西、陕

表一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谱系

距今年代 (千年)	地质年代	文化分期	华北地区		华南地区	
			周口店系统	匼河系统	西南	东南
2000	早更新世	旧石器早期		西侯度文化	元谋文化	
1500			小长梁石器			
1000	中更新世					
500			蓝田文化			
100	晚更新世	旧石器中期	周口店文化	匼河文化	观音洞文化	和县龙潭洞
50			许家窑文化	丁村文化	岩灰洞文化	
15		旧石器晚期	峙峪文化		富林文化	
			虎头梁文化	下川文化	穿洞文化	东海大贤庄

西、河南、河北和辽宁等省，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有发现。其中最早的遗址，要数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阳原小长梁两处，地质年代均属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遗址发现于河湖相沉积层中。石器打制方法原始，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石片石器均为单面加工，很少有砾石石器。石器个体较大，类型不甚固定，大致可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遗址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为180万年^①。

小长梁石器发现于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多用锤击法打制，个别有用砸击法的，石片也多为单面加工。多数个体较小，类型稍比西侯度复杂，大致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石砧等，此外还有许多未经第二步加工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②。

两处遗址虽都属更新世早期，但文化面貌显然不同，很可能代表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早在1972年，贾兰坡先生就曾指出华北旧石器文化至少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匼河-丁村系，另一个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③。二者各自包含一大群从早到晚的遗址。西侯度很像是匼河-丁村系的发端，小长梁则有可能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始原。

所谓匼河-丁村系又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小型石器不多，类型也简单。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晋、陕、豫三省的交接地区，包括旧石器早期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山西芮城匼河文化、河南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旧石器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文化、河南灵宝孟村等。这个系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不甚清楚。有的著作将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遗址和已进入新石器早期的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都归入这一系统，因为这两处都是大型石器为主，而很少小石器和细石器。但这两处遗址都是石器制作场，所制石器不免要受到原料和某些条件的限制，难以反映所属文化石器工艺的全貌。两处遗址远离匼河-丁村系的传统分布区，反而与另一系统的遗址交织在一起，这也是耐人思索的。因而它们的归属还需商榷。

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又被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小石器。这种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而大型石器则相对较少。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分布甚广，包括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北部和宁夏、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南部。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和本溪庙后山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山西阳高许家窑、辽宁喀左鸽子洞和海城

^①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② 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③ 贾兰坡关于华北存在两个旧石器文化系统的见解首先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其后于《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西侯度》、《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均1978年）两部著作中再次提出并加以修正。

仙人洞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则有山西朔县峙峪、河北阳原虎头梁、内蒙古伊盟萨拉乌苏河等处。从这个系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器逐渐细化，以致到后来出现真正细石器的过程。它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衔接也比较紧密。

总起来看，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两个文化系统的特征是明确的，分布上也各有疆域。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遗址显著增加，分布面一直扩大到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单从石器工艺看也有很大进步，往往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小长石片，有些第二步加工已开始用压削法。石器类型比较复杂，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刮削器又可分为圆头刮器、边刃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多种，其它还有尖状器、雕刻器和簇等。大型石器则有砍砸器、石锤和砾石等。这些都是普遍的倾向，原先两个石器传统的分界已经不太清晰了。

这种石器普遍细化的倾向，应同技术的进步和复合工具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刮削器和雕刻器都可以安柄，当然就不必做得那么大了；弓箭是新的发明，它要求箭头也是小型的；甚至某些标枪也可以在木制或骨制头部嵌上小石片来构成。这样原来的匼河-丁村系的大石器传统必然向小石器乃至细石器发展，原来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细小石器传统更是顺利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总的发展趋势中，当然不排除后者对前者发生较大影响的可能。这大概是两个系统的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的主要原因。

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并非都已融为一个整体而没有任何分际了。例如峙峪和山西南部的下川文化就有不少差别。下川小长石片的比例比峙峪大，细石器中的锥钻亦为峙峪所不见。下川大型石器种类远比峙峪复杂，其中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砾石和研磨盘等。从地理位置及文化特征来看，下川文化应是匼河-丁村系的继续发展，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峙峪文化的若干影响。其它地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如果仔细比较，很可能划分为好几个文化区。一方面是因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影响而使统一性加强，一方面也是因文化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分化，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得到了发展。

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也相当广泛。按地理位置可以分为两群，一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另一群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省。其中最早的要数云南元谋上那蚌遗址。该处出土了两枚人牙化石和几件石器，石器均用锤击法打制，加工粗糙，形制不规整，主要是刮削器，也有尖状器。所属地层用古地磁法测量距今约为 170 ± 10 万年^①，与华北的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十分接近。

华南旧石器文化既不同于华北的匼河-丁村系，也不同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其石器多用锤击法打制，有的地方则有锐棱砸击法，器形多不规则，类型也不如华北的确

^① 袁振新等：《云南元谋人化石产地的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